

亚洲经济在转型中孕育新动能

论坛聚焦

改革创新将为东北插上二次腾飞翅膀

本报记者 朱轶琳

对话嘉宾：

姜有为 吉林省副省长
潘利国 辽宁省沈阳市市长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施新一轮的东北振兴战略。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将从过去的“汗水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这个过程中对东北二次腾飞会有哪些助力?3月23日,在2016年博鳌亚洲论坛题为“振兴东北:‘工业摇篮’二次腾飞”的分论坛上,吉林省副省长姜有为、沈阳市市长潘利国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就二次振兴东北的话题展开了讨论。

“东北目前出现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问题归根到底是体制问题,是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问题。”姜有为说。

“东北正处在二次振兴的历史关键点。”在东北求学、工作过的迟福林表示,第一次东北振兴注重投资拉动,在结构调整及制度创新方面,没有真正破题,遗留了很多问题,在全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这些矛盾就凸显出来了。

为什么东北制造业转型升级困难?迟福林给出了两个数字:德国服务业占GDP的70%,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70%。而东北在这两方面,恐怕连一半都没有达到。他认为,现代服务业占比低恰恰是制约东北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薄弱环节。

“对吉林来说,要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走出一条质量更好、效益更高,优势能够得到充分释放的振兴发展新路子。”姜有为说,吉林省委、省政府在战略谋划上主要考虑要发挥五大优势,推出五大举措。发挥五项优势指的是老工业基地振兴优势、商品粮基地优势、生态良好优势、沿边近海优势和科技文化人文优势等。所谓推进五项举措,就是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创新的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城镇化建设,加快协调发展;推进生态建设和资源综合利用,加快绿色发展;推进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开放发展;推进人才强省建设,加快共享发展。

“去年沈阳被中央批准为全国8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之一,这既是机会,也是考验。”潘利国介绍说,装备制造是沈阳的产业基础,沈阳发展的方向就是要实现新型工业化,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创新基地,并成为“中国制造2025”的先行区。

沈阳有3500多家骨干企业,大都面临着动能转换。从去年开始沈阳实施了智能化转型行动计划,上千家企业围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政府给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和资金支持。需要‘升级诊断费’的,政府拿20%;技术改造政府又补贴20%。这个转换的过渡期就是在培育新兴产业的过程。”潘利国说。

“对外开放程度、市场开放程度、产业开放程度严重滞后也是制约东北振兴的突出问题。”迟福林建议,东北在对外开放上要加大力度,国家也应大力支持。

董文标：

推动贴近百姓需求的普惠金融

本报记者 吴凯 李治国

自从联合国2005年提出普惠金融这一概念之后,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成为金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在本届博鳌亚洲论坛上,中民投董事局主席董文标表示,普惠金融需要深化制度改革,贴近百姓需求,不能只想做锦上添花的事情,而是要雪中送炭的事情。

董文标表示,普惠金融业务的开展,近些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金融机构都很重视。但在现有的银行、保险等金融制度下,普惠金融在中国的推行仍有一定难度。要发展普惠金融,必须继续深化制度改革,改善金融服务理念,推动建立符合中国百姓的普惠金融制度。

董文标认为,由于制度沿袭的原因,中国金融体系偏重为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服务,忽视了对中小微企业和农村市场的服务。金融领域的从业人员也形成了为大企业服务的工作观念,只想做大的,不愿做小的,忽略了中小微企业及个人市场业务的开展。目前,在城市中的金融问题大多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普惠金融真正的意义在于,要使金融服务更为“平民化”,必须服务农村人口和中小微企业。与高端金融理财服务的客户群体不同,普惠金融的主要客户群体是具有长尾特征的中小微客户,这类客户平均资产规模小,但数量庞大。

一直以来,金融机构对于这些客户采用传统的银行服务方式。董文标认为要深化制度改革和服务理念,推动建立更贴近中国百姓需求,符合中国中小微企业需要的普惠金融制度。他建议从两个方面入手:在农村市场,可以通过盘活农民的宅基地资产,如果宅基地可以认定为农民的资产,银行可将其作为抵押物,从而使资产转换成金融资本,避免城乡二元体系造成的资产巨大差异;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可以根据大数据定律对中小微企业分类,有针对性地为其提供服务,小微企业将是非常大的市场。



博鳌亚洲论坛不仅是思想交流的重要平台,而且也已成为各地展示改革创新成果和举措的国际窗口。图为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会在论坛期间与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本报记者 杨忠阳摄

本报记者 杨忠阳

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看经济形势要看大图。现在整个亚洲共有25万亿美元GDP,中国GDP有10.5万亿美元,占比40%,印度、韩国、日本和东南亚约11万亿美元,剩下的5万亿美元属于西亚和中亚国家,所以从整体上看,亚洲前景还要看中国。

“中国现在确实是在进行一番调整,但是这个调整是充满希望的。”李稻葵说,“今年尤其是下半年,经济会有所企稳回升。当然我们看经济不能只局限于今年,未来三四年,中国如果能够利用现在比较好的条件,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清理呆账坏账,把‘三去一降一补’落实到位,未来两三年增长速度还会上去,这就是我说的大图。”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从数据上来看,如果今年亚洲经济能实现6.5%的增长,这和国际金融危机以前亚洲新兴国家平均增长速度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内部经济结构正在经历调整,“这也是亚洲经济转型、新旧动能转换中必然会出现的

情况,因此没必要那么悲观”。

加快改革和协同

黄益平表示,当前亚洲的增长模式确实遇到比较大的挑战:一是外向型经济。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国家出口市场扩张速度明显放慢,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难以继;第二,新旧产业交替。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两驾马车是出口和投资,出口的背后是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背后是西北、东北资源型重工业。这两个产业现在遇到一些困难,重工业产能过剩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成本升高。这意味着这两个产业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支持经济的增长。而且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在亚洲很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

下一步靠什么来支持亚洲经济持续增长?黄益平认为,首先必须通过转变增长模式,创造出高附加值、高技术、能够在高成本基础上具有竞争力的新

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李稻葵以现在碰到的产业更替问题为例分析改革的核心,“我们的改革政策一方面要帮助已经失去竞争力的产业平稳退出,一方面要支持新的产业形成和发展,这必然要面对‘僵尸企业’如何退出的问题,也必然面对我们应怎样支持创新、支持产业升级的问题。这其中就涉及多方面产业政策问题,包括金融政策、创新支持等,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决心,更需要智慧”。

在加快改革同时,亚洲国家还要加强金融协同。朱民表示,“亚洲是个很大的区域,各个国家的金融政策和金融市场差别很大,加大区域之间的金融政策合作和市场往来,促进资金交流、技术交流和监管协调,也是当前亚洲区域内要做的”。

“亚洲2015年输入约17.5万亿美元,输出约22万亿美元,还是一个净资本输出区域,这意味着亚洲经济增长潜力还很大。”朱民说。

博鳌随想

旅游已成海南支柱产业

本报海南博鳌3月23日电 记者何伟报道:今天,海南省政府在博鳌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在会上介绍,旅游业已成为海南省的支柱产业,海南将继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毛超峰用一组数据说明了旅游业对海南的重要性。“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的这5年,海南累计接待游客人数超过2亿人次,年均增长11.7%,实现旅游总收入2210.74亿元,年均增长16.1%。旅游业的增长值已经占到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7.6%,旅游总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5.5%。在旅游业直接就业的人口已经达到37.28万人,间接带动的相关产业就业人口达到140万人。”毛超峰说,旅游业已经成为海南省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海南坚持生态立省,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碧水蓝天就是最大本钱”的发展理念。海南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生态优先,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强化生态环境的法治建设,完善地方标准,采取了划定生态红线等一系列措施。“刚刚过去的5年,仅就生态建设,我们颁布了74项涉及到环境保护的法律规章、地方法规,健全和完善了生态补偿机制。特别是在‘十二五’时期推进了我们中部重点生态区域市县不再考核GDP的做法。”毛超峰说。

5年来,海南持续推进“绿化宝岛大行动”,累计完成造林159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62%,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海南全省过去5年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7.9%。特别是海南依法依规划清理闲置土地,处理闲置土地达13.62万亩;加强环境污染的治理,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和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分别达到94%和80%;近岸清洁海水水质面积保持在90%以上。

毛超峰说,海南还开展了“整治违法建筑三年攻坚”,推进全省海岸带保护开发与检查、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城市(镇)内河(湖)水污染防治等六大专项活动,解决了一批突出的区域环境质量问题。

本版编辑 康丹

博鳌支招

结构性改革是世界经济复苏出路

本报记者 禹洋

欧洲、日本等国相继推出了各项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在短期内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动力问题,还是要在中长期政策上下功夫,以改革促发展。“改革,尤其是经济结构调整,短期内会带来阵痛。但只有通过各项结构性改革,优化市场环境,鼓励创新创业、培育研发力量,才能从根本上为经济发展积蓄动力。”福田康夫说。

巴基斯坦前总理阿奇兹从发展中国家角度,提出了改革的另一个要点——鼓励私营企业发展。“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我们的目标不能仅限于实现增长,而是要有高质量的增长。”阿奇兹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私营企业发展不足问题,如何通过结构

性调整,创造公平开放、监管合理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私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是发展中国家结构性改革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发达国家在本轮世界经济放缓中“自身难保”,并未起到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有分析认为,固守成规、不思改革是发达国家深陷危机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爱立信董事长约翰森并不赞同,“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国家就意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近5年来实施的改革措施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在社会福利、养老金、退休时间等改革困难重重的领域,欧盟克服阻力推动了改革。”但约翰森认为,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有创业精神的年轻人,应该通过改革为创业者提供更好的条件。

除了结构性改革,加强区域合作、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是实现全球经济增长的另一条出路。“如何创造亚洲的新未来?区域一体化是必选项。东盟10+6、中日韩FTA、RCEP、‘一带一路’,这些合作机制已经为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认为,博鳌亚洲论坛应当继续发挥好区域合作平台的作用,推动各国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的交流与合作,让区域合作在拉动各国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其强大的力量。冯氏集团主席冯国经给出了一组数字:30年前,经合组织成员国在全球消费中的占比为84%,但现在下降到70%左右;未来,世界上超过50%的消费将来自发展中国家,70%的消费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

特写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而严峻,2014年刚刚起步的复苏势头严重受挫,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会低于去年。”在3月23日下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理事对话会上,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开场便道出了对于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的担忧,“国际贸易大幅下挫,美欧日增长低于预期,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国际资本市场动荡不断,各国经济都面临巨大考验”。如何破解全球经济和各国发展难题?进行结构性改革和加强区域合作成为论坛理事们不约而同的答案。

为缓解当前面临的巨大经济压力,